

唐宋八大家列传

苏轼传

颜邦逸 张晶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A traditional Chinese red ink wash illustration. In the upper left, a bird, possibly a hawk or eagle, is shown in flight with its wings spread. Below it, a butterfly is depicted. The lower half of the image is dominated by a large, detailed drawing of a lotus flower in full bloom, with its stem and leaves extending across the frame. The entire scene is rendered in various shades of red ink on a light-colored background.

唐宋八大家列传

苏

轼

传

颜邦逸
张晶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Sushi Zhuan

苏轼传

颜邦逸 张 晶 著

责任编辑:吕海江

封面设计:章桂征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5 插页 17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1—3 000 册 定价:11.00 元

ISBN 7—80626—280—6/I·45

《唐宋八大家列传》总序

在古代散文史上，唐宋两代是自秦汉之后，出现的又一高峰。这期间相继掀起的两次波澜壮阔的古文革新运动，使唐宋文苑，名家辈出，异彩纷呈。古代散文，也因此而进入了它艺术上最为成熟的阶段。而在唐宋两代涌现的大批优秀作家中最负盛誉的，则是被后人尊称为“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和苏辙。

“八大家”的名称，来自明代散文家茅坤所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这种认识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演变过程。其实，八大家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便已经是以自己的文学才华和创作成就而蜚声文坛。北宋末年，邵博在论文时，也将韩、柳、欧、苏并称。其后，南宋的吕祖谦选编《古文关键》一书，以为后学学习古文的典范，便取韩、柳、欧、曾、苏洵、苏轼和张耒七家文为范文。至明初，朱右选编《八先生文集》，又在吕祖谦《古文关键》的基础上，去张耒而补入王安石和苏辙，于是便首次有了所谓“八先生”的称号。这一认识发展至明中叶，又因文坛上复古与反复古的角逐而得到了确认。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复古主张，唐宋派作家一力标举唐宋古文，力图以有规可循的“唐宋模式”来替代无法可依的“秦汉模式”。唐顺之选编《文编》，于唐宋两代，便只录上述八家文章。接着，茅坤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问世，

“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儿无不知有茅鹿门者”（《明史·茅坤传》）。“唐宋八大家”的称呼因此也得以成为定论，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对于这一提法，清代以后，也有些人持有异议，但从总体上说，它还是得到了社会的广泛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经过较严格的历史的筛选之后，人们所达成的共识，这中间因而也就有其合理的内核。这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他们的崛起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他们相互间又有着大体一致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倾向，成为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中坚，甚至领袖人物。他们共同为古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特别突出的贡献。其次，是他们以自己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创作，极大地丰富了古代散文的艺术宝库，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从林林总总的唐宋古文家中，遴选出这八家，并将他们的作品树作唐宋古文创作的丰碑，确实较好地反映了古代散文史上这一重要发展阶段的历史面貌，较充分地展示了古代散文走向艺术上成熟过程中所取得的历史性进展。

“八大家”的艺术风格各不相同，文学成就也有高下。以风格而论，韩文雄奇，柳文峻洁，欧文婉曲，王文劲峭，曾文醇厚，苏轼豪放，老苏恣肆，小苏澹泊，都自成一体。以散文成就而论，韩、柳、欧、苏（轼）最负盛名，其余四家，也各具风采。八家中，除苏洵外，又都能诗，又以韩、柳、欧、苏（轼）、王成就最高。此外，欧阳修和苏轼又是词坛大家，他们的词，在北宋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八大家”的文论主张与文学创作，是唐宋两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的产物。尽管除柳、王之外，其余六家都称不上是当时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但他们和社会政治、却又都

有过非常密切的关系。“八大家”所处，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其顶峰开始下滑时期。江河日下，百感苍茫。面对这种时代的总趋势，有抱负的政治家们，屡屡力图通过革新朝政来扭转局面，维护那业已日过中天的封建秩序。柳宗元积极参预的王叔文政治集团的革新，王安石倡导的熙宁变法，便都是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政治变革运动。“八大家”的立场与政见尽管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卷入了这些社会政治斗争的风暴里。斗争的残酷以及变革的失败，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各自的坎坷经历乃至人生悲剧。他们的诗文创作，也便都深深地打上了这种时代的烙印，反映着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知人论世”，了解作家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各自的生平阅历、性格气质乃至家庭环境、社会交往，从来都是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面。作家年谱与传记的撰写，因而也历来都为学术界所重视，“八大家”的研究也是这样。从清末梁启超著《王安石评传》，到一些古典文学知识丛中如《韩愈》、《柳宗元》等传记的出版，进而到近十余年中出现的一些“八大家”评传，都反映出这方面的工作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缺乏比较全面的、统一的规划，“八大家”传记的撰写，总体上仍显得不那么均衡，或者体例不一，或者侧重点不同，或者具有较浓的学术考辨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套雅俗共赏的《唐宋八大家列传》丛书的出版，也便有了弥补这方面不足的意义。读者将“八大家”列传相互比照进行阅读，或许会对他们的人生道路和文学成就，有更全面深刻的了解。并永远铭记他们为华夏民族文化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王琦珍

1997年4月6日

蘇東坡



蘇軾



苏轼 (1037—1101)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
眉州眉山(今属四川)
人。文学家、书法家。

目 录

第一章	出生成长	(1)
第二章	科场逐鹿	(19)
第三章	凤翔府判官	(30)
第四章	二次还乡	(34)
第五章	王安石的政敌	(39)
第六章	杭州通判	(46)
第七章	密州知府	(73)
第八章	徐州知州	(81)
第九章	乌台诗案	(95)
第十章	流放黄州	(114)
第十一章	视富贵如浮云	(168)
第十二章	杭州知州	(189)
第十三章	上上下下	(202)
第十四章	流放惠州	(216)
第十五章	兹游奇绝冠平生	(230)
第十六章	北归	(242)

第一章

出生成长

眉 山

提起眉山这个名字，可能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感到亲切，因为它是苏轼出生、成长的地方。表面看，与许多伟人的家乡一样，眉山也并不像能够孕育这样一位大人物的地方。四川僻处西南，群山丛锁，而眉山又是深裹四川腹地的一个普通小县，谁能预期它会钟灵毓秀呢？其实，偶然之中寓有必然，所谓“人杰地灵”，并非虚语。无论我们从自然地理方面还是从人文地理方面去看，眉山都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地方。

浩荡长江的主要支流岷江自西北冲腾而下，野性难驯，经常泛滥肆虐，至战国李冰筑都江堰系列水利工程才变害为利。千余年来，历代增修维护，使川西平原沃野千里，不知水旱。岷江流贯眉山县境，“平铺十里江无声”（陆游《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苏轼《东湖》）她哺育了眉山的富庶。岷江下行，汇入长江，航路通达。这不仅沟通了僻处西南的眉山与祖国东西南北的经济与文化，而且改变了眉山的人口构成。对眉山的文明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此外，眉山与西南大都会成都，保持着不远不近的二百里路程。

这使它可以不受间阻地接受繁华地区的文化，同时，又不失自己安恬的清幽，春秋代序地憩息在盛名盖世的峨眉山巨大的秀影之下，安然孕育着身下子民的胸怀、气概和修养。

眉山偏远而眉山人并不孤陋，他们远不似其他穷乡僻壤人那样易于为州官愚弄。读书人往往兼通法律，一为自己守法，二为监督州官依法办事。贤良方正的州官卸任，县民画像供奉；州官扰民生事，便会感到处处棘手。所以，眉州之民素称“难治”。所谓难治，其实正是文明开化的表现。

还须注意的是，四川这一大地区的总体文化环境也加深了眉山的文化氛围。汉代以来，扬雄、司马相如的滚滚辞涛，唐代以来，李白、陈子昂的喷薄光辉，历代著名文人在四川的流风余韵一直在高天厚地之间久久回旋。加之四川又是中国古代印刷术最早发达的地区之一，宋代的蜀本书，至今还在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此等等，深蕴厚积至宋初，读书应试已经蔚然成风。苏家兄弟应试那年，仅眉山一县被举荐参加礼部进士考试的学子竟有四五十人，当年进士及第者竟达十三人之多。看到这些，谁又能说眉山不像钟灵毓秀之地呢？

苏 家

苏轼早期以“二苏”（与弟苏辙并称）、“三苏”（与父苏洵、与弟苏辙并称）名噪天下，后来才逐渐一枝秀出，所以要介绍苏轼，必须先从苏家说起。苏家自称“赵郡苏氏”，这是因其远祖苏章在汉顺帝时，由冀州（今河北冀县）刺史迁任并州（今山西太原）刺史，其子孙后代遂迁居赵州（今河北赵县）之故。至唐代，苏章后人苏味道是“文章四友”之一，于

神龙初年由凤阁侍郎贬为眉州刺史，死于任所。有一个儿子未回赵州而在眉山定居下来，他就成为眉山苏氏的始祖。此后数代，苏氏隐居眉山未曾出现过显赫的人物。直到苏轼的祖父苏序仍然是一个平民，但他却对我们的传主产生过明显的影响，值得带上一笔。

苏序字仲先，生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卒于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生得魁伟健壮，为人慷慨大度，待人谦恭有礼，无论贵贱，均能友好相处。他出入乡里从不骑马，自己说，是怕见到比自己年长的人步行，会使自己惭愧，无法面对。他热心助人，屡求不厌。他在乡下住时，旱田不多，全部种上谷子，又用稻子跟别人换谷子，用大粮仓储存，谁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像这样储存了好些年，谷子的总数达到三四千石。一年，眉山发生了大饥荒，他便开仓出谷，赈济灾民。先给苏氏本族，接着给妻族，再接着给自家的佃户，给同村的贫民。依次散发使大家都平安度过了灾年。有人问他：“您为什么一定要贮存谷子呢？”他说：“谷子坚实耐贮存，所以才大量贮存备荒。”

苏序嗜酒，喜欢跟村里老人席地而坐，痛饮高歌。有一天，他正喝得大醉，朝廷因他二儿子苏涣而诰封他官衔的文书到了，同时还有苏涣为他购置的官服、官帽、笏板、交椅等一应必用品送到。他当时衣冠不整，坐相不雅，醉醺醺地一把抓过文书，草草读完，将文书与各种杂物统统塞进一只布口袋里。同时，将没有吃完的大块牛肉，也塞进一只布口袋里，让村童替他背着，而自己则骑驴进城。城里听说他接受了封诰，一些人跑到郊外来看他，在路上遇到，见只有两只窝窝囊囊的布口袋，没有不放声大笑的。

更出众的是，他这个人不信神。眉山有座大庙，供奉着一个叫毛将军的神像，全县人没有不敬畏的，据说祈祷求告，十分灵验。苏序却不以为然，一天，他乘醉喊上二十多个村仆冲进庙里，挥斧砸碎了神像，把碎块全部扔进了山溪里。同时，把庙也拆毁了。事后，安然无恙。

他生平不好读书，晚年却迷上了写诗。乡间生活、县城见闻都能引发他的诗兴。所作竟有一千多首，可惜未能流传下来。

我们轻描淡写地为苏序所勾画的这个身影，读者不久就可以从他的孙子苏轼身上发现亲切的相似之处。

现在，我们该来介绍苏轼那著名的父亲了。苏洵字明允，南宋以来常有人说他号老泉，而另一派人却说：“老泉”是苏轼晚年的别号（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十所载即为一例。）至今聚讼，未能衷于一是。他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卒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苏序生有三子：苏澹、苏涣、苏洵。老大、老二都全力读书，以考进士为业。老二在天圣二年（1024）进士及第，使眉州人大为振奋，一时，读书向学者达到千余人。但老儿子苏洵却与两位哥哥大异其趣。他从小“游荡不学”，性喜游山玩水。令人惊异的是，他父亲苏序见他已至青年，还是不肯读书，不仅听之任之，不闻不问，而且在乡邻族人询问此事时，令人神秘莫测地笑而不答。后来又对人说：“他可不是那种会让人担心不肯向学的人。”

苏序这样说，绝不是故弄玄虚。他一定是眼光特异，看到了很多一般人看不见的东西。他可能看到了老儿子非凡的才能志趣，看见了死读书的弊端，也许还看到了读社会和自然这本书的妙用。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苏洵自己后来曾说：“知我

者唯吾父与欧阳公也。”（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应该说苏序才真正当得起“知儿莫如父”、“教子有方”这样的褒辞。

宋人王应麟所编儿童启蒙课本《三字经》中“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这几句话确是由苏洵自述而来，它把苏洵生命中一次重大转折宣扬得尽人皆知。王氏本意在于教诲求学者向前看，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他抽取了苏洵晚学有成的结果，而忽视了个人秉赋、志向、家庭背景和条件，尤其忽视了苏家父子超流俗的眼光和行事原则。而这对于孕育杰出人才，恰恰是忽视不得的特出家风。

严格说，苏洵这次发愤，并非他成就事业的直接原因。事实是，他从此郑重其事，全力以赴面对科举考试，一心要遵循此路出仕，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宏愿。此前，他未曾认真对待过这种考试。此后，日夜苦读，学问大进，二十九岁入京应进士试，却落第而归。再接再厉，三十七岁又入京应制举，仍然空手而返。至此，他才算真正悟透了科举考试那种“章句、名数、声律之学”束缚思想，根本不适合自己的个性和情趣。慨然道出：“此不足为学也！”（见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的豪言。毅然决然弃旧图新，一炬烧尽过去所作的数百篇文章，完全抛弃那些为文而文的陈腐章句、声律，而以崭新的眼光重新研读春秋战国、汉唐以来经世致用、生气郁勃的“古文”。为了彻底扬弃旧日积习，甚而至于闭门读书五六年，绝笔不写文章。然后，在读书、游历中形成了卓越的识见。于是纵横捭阖，开一代新风的古文出世了，宋代散文大家苏洵出世了。虽然从政治抱负来说，苏洵可谓抱憾终生；但从文学成就和影响来说，却也算是无愧于心了；尤其是对他那著名的儿子来说，他更称得上是一位巍然赫然、可钦可敬的父亲。他一生大开大

阖，敢做敢为，傲然立世，极有个性，给儿子奠定了为人为学的基础。限于篇幅我们只能略叙其梗概。

现在该介绍苏轼的母系宗亲了。

苏轼的外祖父程文应任大理寺丞，其家为眉山巨富。文应的儿子程浚与苏轼的二叔苏涣同科进士及第。两家连姻，苏序与程文应都因儿子及第当官而受封。程家按部就班预做准备，并关照苏家老爷子也预做准备。而苏序不以为然，故而出现了我们上文所述那潇洒的一幕。

苏家资财远逊程家，文应的女儿嫁给苏洵，从来不曾流露过一丝傲慢之意或不满之情。她庄静贤淑，深得苏洵那位“老而性严”的祖母的欢心。无论丈夫怎样“游荡不学”也从未表示过忧虑，而一旦苏洵发愤向学，同她商量说：“我自己觉得，现在还可以学习深造，然而家庭靠我维持生计，治学就会影响家庭，怎么办？”她竟然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老早就想说这句话了。怎么才能让您把精力用到学问上去呢？您如果真有志向，把家庭负担放到我身上好了。”她说到做到，将家中所有贵重首饰和玩赏之物都变卖成资金，以此求利，没有几年苏家便成了富家。苏洵因此才能心不旁骛，做成大学问。

程氏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即有节概志向，喜欢读书。长大后，通晓古今，懂得国家治乱得失的内在原因。她操持苏家倾心竭力；相夫教子，高瞻远瞩，可谓中国古代不可多得的巾帼精英。她为人善良，律己甚严，对苏门家风有良好的导向。苏家在纱縠行租房居住时，一天，两个婢女熨衣物，忽然，立脚的地方塌陷进去，露出个几尺深的坑，坑里有一只坛子，上面盖着乌木板。程氏夫人吩咐立即用土把坑填平，不准动坛子。坛里有东西，发出人咳嗽的声音，过了一年才静下来。人们都

认为其中一定有埋藏的物品，想要发掘。后来苏家搬迁，夫人的弟弟程之问租下这座宅院，挖地一丈多，也没有找到这只坛子。这件事，清楚表明程氏夫人不贪意外之财，不作非分之想的淳朴道德操守。上行下效。后来苏轼在凤翔府当签判，一天下大雪，居室边古柳树下，有一尺见方的地面不积雪。天晴后，地面凸起几寸高。苏轼猜是古人埋藏丹药的地方，想要发掘，妻子王弗劝阻说：“如果婆婆还活着，她一定不肯发掘。”于是苏轼惭愧地中止了这件事。

苏家书房前，竹柏花卉满院丛生，很多鸟雀在树上筑巢。程氏夫人不杀生，不准孩子和婢仆捕捉鸟雀，几年一过，鸟雀都在低矮的枝干上做窝，雀蛋俯身可拾。甚至珍异难见的桐花凤，也会四五天一次地来这里憩息回翔，一点也不怕人。街坊邻里都把这当作异闻。当时，虽然没有今天生物圈的概念，但苏家院中自然与人的和谐氛围，对幼年苏轼的陶冶之功却是难以估量的。可以说，没有程氏夫人，就没有文坛上的“三苏”，关于这一点苏洵比谁都清楚。他在《祭亡妻文》中表达了自己“内失良朋”的无限怅惘依恋之情。

苏洵夫妇共生了六个孩子，三男三女。三个男孩子中，老大还在襁褓中便已夭折，苏轼排行老二，所以他字子瞻又字和仲。老三便是苏辙。三个女孩子都是苏轼的姐姐，前两个均早夭。幼女八娘在十六岁时嫁给了舅父程浚的二儿子程之才。谁知婚后不到两年便凄然病死。这对于苏家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心灵的创伤永世难以弥合。八娘是仅比苏轼大两岁的小姐姐。她聪明可爱，幼而好学。除与当时同龄女孩一样勤习针黹之外，少女情怀主要都倾注在读书作文上，所作文章往往令她那文章大师父亲惊喜莫名。苏轼没有妹妹，民间传说的旷世才

女苏小妹，可能就是由八娘的形象生发出来的。四川至今还有这个习俗，将女儿称为“小妹”，甚至连他的弟弟也可以这样称呼。

老苏在题名《自尤》的长诗及诗序中，将幼女之死完全归罪于程家。据他说：秀外惠中的女儿新婚不久便向娘家哭诉程家大小格调不高、作风令她失望。自己难以与之合拍。生子后，她身染重病，程家不肯延医求药。被苏家接回吃药治病，病状渐轻。程家却跑来指责她没有及时回去拜见公婆，且夺走她怀抱中的婴儿，致使病情恶化，一卧不起。老苏为自己当初应允程氏求婚而自疚不已。苏洵还写了一篇《苏氏族谱亭记》的文章，文辞更为激烈，痛斥他的妻兄程浚“是州里大盗”。指责他将哥哥的遗孤逐出家门，并侵占其田产，父子一起放纵声色，如此等等。从此以后，苏程两家闹翻了脸，苏洵父子与程浚及其子程之才断绝来往，不再发生任何关系。直至四十年后，苏轼贬官惠州，而程之才任广东提点刑狱，才恢复交往。

全面发展

（以上，我们将苏轼家乡的自然、人文环境和家世、父母、亲属等勾勒了一个粗略的轮廓，意在为这样一位杰出人物何以会在彼时彼地出生成长提供一个起码的理解基础。至此我们可以言归正传。）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阴历十二月十九日生于四川眉山。当时，他家已由乡间搬进了眉山县城，住在纱縠行一座普通宅院中。门前有万竿翠竹构成的郁郁竹林，堂上有经史子集的满架图书。